

火鸟译丛

韦虹译

朱斯蒂娜

胜生编



朱 斯 蒂 娜

〔法〕德·萨德侯爵 著
旻 乐 韦 虹 译

哈尔滨出版社

朱斯蒂娜

〔法〕德·萨德侯爵 著
夏 乐 韦 虹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DQ92/10

责任编辑:宋玉成

封面设计:汪 慧

朱 斯 蒂 娜

(法)德·萨德侯爵 著

晏 乐 韦 虹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街副 291 号)

哈尔滨金太极实业公司照排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125 字数 30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57-736-6/I·174 定价:14.70 元

序 言^①

萨德是谁，是干什么的？他不一个人，因为传记作家们总是发现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主题。他也不是一个哲学家：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有研究的价值，但它们长久以来已被废弃，因此再也无法承担他放置其上的结构的重量。萨德是文学的一部分、抑或是科学、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财产？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研究案例（在对一个死者进行心理分析时，总是会存在某些困难的），尽管他的具有心理病理学特点的冲动目录是独一无二的。萨德也不是一部著作，因为，象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最不可读的伟大作品也是从未被读过的伟大作品。萨德是一个神话，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总是从中啜饮美酒的便利容器。反成规主义者本能地将他奉为一个家族的英雄鼻祖，一位自由的极端鼓吹者，他揭露了所有的社会植根其上的那种虚伪：他敢于思考不能思考的事物，他敢于想象不可想象的东西，他敢于写作不应写作的主题。对于既定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捍卫者来说，他永远是一个怪物，

① 这篇序言是里兹大学高级讲师大卫·考瓦德为“世界古典名著”英译本所撰写的，资料详实，持论公允，对理解萨德及本书都有较大帮助，故移译于此。

一种残忍的色情体现，一个最邪恶的淫秽下流的人，和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威胁。萨德，这个人性中兽性的自诩的解放者，以极端的方式提出了与努力保持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德的平衡的所有自由社会相冲突的问题。被一些人所尊崇，被大多数人所谩骂，萨德制造了一种从人际约束和国家约束中将个人全部解放出来的可怕情形。与大多数为金钱所激发而写作的色情小说作者不同，他将他那毫不妥协的无政府自由解放的大旗深植于哲学理论中，并且投下了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无法忽略和回避的条理清晰的挑战。我们至今仍须回答这个挑战。

“虐待狂”和“虐待的”（这两个词在西文中都是由萨德的名字派生出来的——译注）这些词早已被心理分析学缩略使用，并成为广告作者的一种便利用语。但是，萨德是一个曾为彼德拉克的劳拉所拥有的贵族姓氏，这个家族古老而且高贵，六个世纪以来，它在法国南部的宗教和世俗生活中一直声名显赫，一六二七年萨德家族已经成为拉科斯特城堡的主人，这座现已废毁了城堡，仍旧矗立在阿维尼翁正东的卢贝龙山脉北侧的一个岩层上。萨德一七四〇年生于巴黎的一个法兰西非常显赫的家族孔代王宫的宅内。其父萨德伯爵是一位出身行伍的外交家，他的母亲是德·孔代公主的高级女佣，此后萨德继续呆在孔代王宫，他性格中的傲慢正是在这里由仆人们的骄纵与他父母的疏略所共同造成的。

一七四四年，萨德被送往阿维尼翁，在那里，他的姑母们对他百般宠爱。六岁时由他的叔父德·萨德修道院长开始了对他的教育，他一度曾是伏尔泰的朋友，一个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从他那儿萨德获得了对历史的兴趣和封建显贵的习气和作派。一七五

○年，他被送入巴黎的路易格朗的耶稣会的学校，在那里他得到慈祥的昂布莱特的指导，他给予了他一种散漫的尺度和知识价值观：萨德终生对他怀有感激。一七五四年，萨德转入凡尔赛军事学校，因为他打算参军。一七五九年晋升为上尉，七年战争和休假期间，在巴黎的妓院，他都异常活跃。因他父亲断定他是“狂暴地易于激动”而受到其父的指责，他回信答应悔改。

萨德的军旅生涯因其不喜逢迎和其父资金短缺而告终。一七六三年战争平息即被解职。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位狡诈而又心地狭小的萨德伯爵决定，他儿子应该和金钱结合。尽管萨德所爱，也许仅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倾注在别的地方，但蕾内·佩拉日·德·蒙特罗伊于一七六三年五月十七日在巴黎成了萨德夫人。蒙特罗伊一家近来刚刚成为新贵，她的父亲，原任巴黎税务局的局长，而她的母亲，蒙特罗伊局长夫人，是一位刚强的野心勃勃的女人，被刚刚缔结的这门体面姻缘的光辉前景迷住了眼睛，对他的未来女婿的不体面的名声一无所知，而萨德伯爵也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告知她这一切。萨德总是认为他的岳父母是不可救药的中产阶级，尽管他自己已身价大跌，境况窘迫。婚嫁时的财产是以信托形式安排的，夫妻二人只够维持中等水平的的生活，萨德从未得到他认为他生来就应有的那份收入。

仍然不顾凡尔赛法院还在进行审判的事实，他立即又在巴黎投入他的放荡生活。一七六三年十月，一位名叫热纳·泰斯塔尔的制扇商，她偶尔卖淫以补贴收入，对一个男人提出控告，这个男人长着淡色头发，瘦小，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她后来认出他就是萨德。她指控他在肉体上虐待她，而且沉溺于“令人恐怖的不敬的行为”，这一指控得到调查，萨德因淫荡和亵渎神灵的罪名被送往凡尔赛的监狱。他的家庭出来干涉，将他的判刑从进监狱减轻为从巴黎驱逐一年的惩罚。但是第二年夏天，他又回到首都。警

察们警告妓院不要为萨德提供服务，但不管怎样，萨德现在正全力投入与演员们的一系列具有灾难性的性活动，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女演员是一七六五年他拜访拉科斯特城堡时作为妻子带在身边的那一位。他的生活一直是入不抵出，而一七六七年他那挥霍无度的父亲的死也未能对此带来任何缓解。尽管现在他已是德·萨德伯爵了，但他从未用过这个头衔，仍然作为侯爵而为人所知。

一七六八年复活节的星期天早上，他偶然结识了罗丝·凯勒，一个失业的纺纱工人，并带她到了他在阿尔居埃租用的房子。她后来声称，在违反她的意愿的情况下，他鞭打她，用小刀割她的皮肉，并且在她设法从窗子爬出来逃跑之前，将滚烫的封蜡倒在她的伤口上。萨德承认了鞭打的事实，但却否认用小刀，并且宣称“那种封蜡”是一种消炎膏剂，而且补充说，那些妓女已为她们所做的一切获得了报酬，不应该抱怨。法庭审判的记录表明，原告的证词中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甚至那位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对他宽容的蒙特罗伊局长夫人也认为，她的女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她写信给德·萨德修道院长时说，他所做的一切是“疯狂与淫荡的行为，它不可原谅，但它根本不存有任何它一直被强加的恐怖的色彩。”罗丝·凯勒对事件的夸张描述得到法庭的接受，尽管她获得了相当大数量的补偿已撤回了起诉，但萨德仍被关进了监狱。他在十一月以他必须返回拉科斯特为条件得到释放。

一七六九年的秋天，他周游了荷兰，写下了他对这个国家的一系列的印象。第二年他企图继续他的军旅生涯，但因他恶劣的名声而遭失败。一七七一年他因债务而被短暂收容。自他结婚之后，他在收入之外已花费了 60.000 利弗尔，而且已经负债累累。他现在已有三个孩子，需要大量的钱财支付花销，但钱财的大部分都让他花在了他的享乐上。在拉科斯特他象一位君主一样生活，他醉心于对戏剧的业余爱好，并且，很可能是与他的妻子共谋，开

始了与他妻妹昂娜·普罗斯佩尔的通奸。

一七七二年六月，由他的贴身男仆拉图尔陪伴，他旅行到马赛去兑换一张信用证。四个妓女参与了一个小规模的娱乐活动，其间萨德为每人分发“糖果”，那实际上是由斑蝥或“西班牙莞青”配制而成的食物，当时被广泛认为具有激发情欲的作用。马格丽特·科斯特，四人中的一个，后来病得很厉害，当局出面调查。萨德潜逃到意大利，走时带走了拉图尔和昂娜·普罗斯佩尔。人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审判了他，而这幸存的诉讼又一次表明了对他起诉的案件并没有彻底反映事实。尤其是对马格丽特·科斯特的身体检查报告并未发现萨德被指控对她下毒的任何痕迹。萨德和拉图尔被认为犯有鸡奸和毒杀未遂罪，两者都是最严重的罪行。侯爵和他的男仆被判处死刑，他们的模拟像被当众烧毁。

从意大利，萨德安全地到达皮埃得蒙的尚贝里，逃出了法国当局的权力范围。然而，他无法逃过局长夫人，她由于迫切地要为家庭扫除进一步的羞辱，设法安排拘留了他，并且将之收监在附近的米奥朗。萨德气愤已极，书写了许多言辞激烈的抗议信，五个月的监禁生活之后，他成功地逃跑了。他最终返回拉科斯特，并且尽最大努力去劝说埃克斯议会撤回对他的判决，说服局长夫人停止对他的迫害。一七七四年末，在拉科斯特他负责安排了一场狂欢，而这场狂欢导致了更多的起诉。他又逃到了意大利，在那儿开始为一部一直未能写作的书籍收集材料。一七七六年夏天返回法国时，他在拉科斯特又参与了一些丑闻。他虐待的一个姑娘的父亲如此激愤竟对侯爵开了几枪。一个月之后，在一七七七年二月，萨德与妻子旅行去巴黎，也许是去看他的母亲，她病得很厉害，在他们到达之前便死去了，也许是为了去澄清他的名声。

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三日，国王应局长夫人的请求赐予她有国王封印的信件，命令她监禁作为家庭耻辱而对本人也是一种危

肋的女婿。萨德被捕并被送到凡尔赛监狱，他相信只是在他的审判被修正之前监禁在那里。局长夫人明确阐明的她的看法：只有承认他是疯子，他才有可能推翻对他死刑的判决。萨德拒绝以神智错乱作为辩护的理由，因此在一七七八年六月被护送到埃克斯省去面对他的法官们，这些法官在检阅了事实并且在考虑了这个家族的利益之后，赞成一七七二年达成的评决，但却将死刑减轻为惩戒，命令其改正生活方式，并下了三年之内禁止他拜访马赛的禁令。然而，萨德解脱的时间并不长，在他离开法庭之时便立刻又被逮捕了，因为命令监禁他的国王亲赐的密信还没有取消。他巧妙地逃避了他的护卫警察，但两个月之后，在一七七八年九月，他又被逮捕，并又被送回凡尔赛。他从未再逃脱过。

他是一个很棘手的犯人。他对他的看守越来越生气，写出了如此激烈如此淫秽的信件，以致他通信的权利有时也被中止，而被他怀疑为不忠的妻子有时也被暂时中断探监的权利。他要求了解他苦难的期限，并且开始对数字着魔。他怀疑信中句行的数目，一个词或词的某一部分反复出现的次数，是他获释日期的暗示。到一七七九年末，他开始创作剧本，他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什么天分。但是他也广泛阅读，到一七八二年写作《牧师与濒死者的对话》时，他已经建立起了他哲学的基础，它阐明，既然一切都是自然的，那么人类的标准也许就不可能判断任何事物。他的哲学使他摆脱了内疚，而他的文学活动则对他的智力能量输通了渠道。一七八四年他被转押到巴士底监狱，在那儿，按照犯人的地位，他继续获得一些特权。他抱怨肚子疼、眼睛有毛病，到一七八七年他变得异常肥胖。到那时，因为总是以“超人”的速度工作，他已经完成了《索达姆城的一百二十天》(1785)和《阿利恩和瓦尔库尔》(1785—1787)两部作品，后一部被他称为他的“哲学小说”。《美德的不幸》是他在一七八七年的夏天用两周的时间写成

的，第二年，他写作三十五篇故事（其中三分之一已丢失），他认为这些故事可以使他成为“法国的薄伽丘”。在一七八八年十月，他列出了他已完成的作品的目录，他后来估计，那些作品可以填满十五卷印刷的书籍。在所有这段时间，德·萨德夫人仍然忠实，而局长夫人仍然是不宽容的。

一七八九年七月二日，他临时自制了一个扩音器，依照监狱的记录，他“从他的窗子边不断向外呼喊，说里面的囚犯正在被屠杀，人们应该闯进来解救他”。因为这件事，七月四日他被转移到夏朗德的疯人院。十天之后当巴士底监狱倒塌时，他留在那儿的家俱被劫掠，他的许多手稿都失踪了。他一直在夏朗德呆到一七九〇年四月，国民代表大会大赦因带有国王封印信件而被关押的犯人时，他获得了自由。萨德夫人拒绝见他，并着手办理分居的事宜。八月他遇见了玛丽·康斯坦斯·凯斯内，一位性情甜美的女人，她在萨德的余生中一直对他忠诚专一。

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萨德至少再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选择仍然呆在巴黎，不是因为他赞同革命，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家乡南方的民主主义者的绞刑架。他悲叹贵族权利的废除，对贵族财产的攻击，枷锁中的国王以及现在正在治理国家的“三万土匪”。他的政治观点仍然很温和。他最终开始蔑视路易十四，他因为逃到维也纳而打破了他国王就誓的宣言；但私下里他更喜爱君主立宪体制，欢迎恢复贵族的权利。当一七九二年拉科斯特遭革命者劫掠时，他粗野地称那些毁掉他的私有财产的人为“掠夺者”和“强盗”。但是他尽职尽责地担任市民的警卫，偶尔写作一些支持革命的政治宣传单，成为巴黎他所在的区里的书记员，并最终成为那儿的区长。他在一个设立于首都的医院宣传人道主义改革的委员会任职，被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大屠杀所震惊，并且在一七九三年利用他的影响保证了蒙特勒伊一家的名字

不出现在有要移居国外的嫌疑名单上；后来他写道，“如果我说了句话，那他们就死定了。但我保持沉默：那是我的报复”。他对受迫害的牺牲者表现宽容的作法并未使他得到极端主义者的喜爱，他最终被以“为共和国的敌人提供情报和联络”的罪名被捕。从他监狱的窗子，他可以看到人头在地上滚动。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他被判处死刑，但由于混乱，人们无法查清什么时候该轮到他受刑。两天以后，罗伯斯俾尔倒台，屠杀停止。萨德，这位拒绝给他的小说主人公以上帝的安慰的人物，自己却如有神助似地获救了。

一七九〇年在离开夏朗德时，他曾试图在剧院开创他的事业，但却获得极少的成功：他最努力的果实，《奥克斯蒂埃恩的伯爵，或放荡的后果》（1791）演出时，观众的叫喊声压过了演员的声音，在第二次演出时便被迫停演了。一七九一年六月，尽管他后来否认与这样一本邪恶的书有任何关联，当时他说他为了钱，出版了《朱斯蒂娜》，《美德的不幸》的一个扩充本。一七九四年十月，当他被释放时，他再次尝试。一七九五年，《阿利恩和瓦尔库尔》终于与《卧室里的哲学家》一同与观众见面。但成功仍与他无缘。到一七九六年他与玛丽·康斯坦斯已贫困潦倒，他们出卖了拉科斯特城堡。尽管他仍然是其他财产的主人，他被错误地归入移民者的名单中，并因此丧失了使用他的任何财产的权利。一七九七年他出版了《新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后附她姐姐朱丽埃特的历史，或邪恶之成功》，这本书没赚来任何钱财，相反却带来更多不需要的恶名。一七九九年他在剧院工作，每天获得四十个苏的报酬，并在《奥克斯蒂埃恩伯爵》重新上演时，扮演法布里斯的角色。新世纪的第一天人们发现他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内“虚弱而且身无分文”。

然而，他并没有停止写作。他发表了一个故事集《爱之罪

恶》，它受到新闻界的谴责，而带淫秽插图的《朱斯蒂娜》的一个新版本也被警察没收。因为在大革命的动乱的十年之后，普遍存在着一种新的清教主义思想。萨德被捕，并且在一八〇一年被押进监狱。两年之后，因为企图诱惑一位新来的同室囚犯，他被转回到夏朗德疯人院，在那儿，一个官方的报告将他描述为“不可救药的”，而将他的病情描述为“一种放荡的智力的永久丧失状态”。尽管许多人认为他不是疯癫而是恶劣，并且做出许多努力要将他转移到一个为传统的犯人而设的更为坚固的监狱，但萨德仍然呆在夏朗德，写作——一八〇七年《弗洛贝拉的日子》被没收——并帮助排演戏剧，医院的院长将他的这一活动当作治疗的一种方式。仍然迷恋于数字，仍然由玛丽·康斯坦斯前来探望，萨德将她当作女儿，他已变成一个郁闷呆滞的遗物，被那些来参观或视察医院的人们无一例外地描述为“堕落的怪物”。一八一三年他开始了与一位清扫女工十六岁的女儿的暧昧关系。一八一四年末他突然死去。他的遗嘱要求将他埋葬在一座不署名的坟墓中，让野草随意在坟上生长，这样，“在我看来对我的记忆已经从人们的心中消失时，我安息场所的所有痕迹也应该从地球表面消失。”

但是萨德是一个怪物吗？他对昂娜·泰斯塔耳，罗丝·凯勒，以及马赛的女工们的虐待表明他是。然而，当将他放入事件发生的大环境中去时，这种断然的判断便不那么容易站得住脚了。法国的十八世纪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个丧失了理智和优雅的时代，过分奢华的作品（华托创作的装饰画，由拉莫谱写的音乐）为了审美享受的目的而被搬上舞台。但是现实却相当不同。在巴黎，拉皮条者和老鸨们设法弄到女售货员和渴望成功的乡村姑娘，这些姑娘别无选择，只有屈服而成为性奴隶，而且相当频繁地是屈从

于他们的顾客的反常的性爱好。七分之一的妇女涉足此道。根据当代的估算，每年有一亿五千万利弗尔消耗在“维纳斯的享乐”之事上，如果估计正确的话，这个数目是花费在解脱穷人疾苦的金钱数目的五十倍，是一七八一年贸易亏空额的两倍，并且相当于一七八九年王室债务的二分之一。国王本人起了带头的作用，他在凡尔赛开辟了一个鹿园，其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刚刚发育成熟的姑娘；王室的私生子数量如此之多，据说，在君王乃臣民之父这一具有政治色彩的陈词滥调中，有可能存在着大量的真实成份。“豪侠”是一个空心的庸品——在行话中它是花柳病的一个委婉语——而且那个时代的唐璜们仅仅是买下他们的被俘虏的人；一个女士的宠爱，只有这最后的东西才有一些价值。一七七四年，德·黎塞留公爵准备要焚烧德·拉波普利尼埃尔的房子，以便能更好地与她随心所欲。一七七六年，当德·孔代王子去逝时，他遗留下几千个戒指的收藏品，每一个戒指都是他满足过的一个女人的纪念品。庇护首都妓院的神职人员成群地被逮捕——而且在这些享乐的牧师当中包含萨德的叔父，德·萨德修道院长，他在一七六二年遭逮捕，被指控犯有淫荡之罪。尽管道德家们正当地进行抗议，但德·萨德修道院长仍然担任图卢兹的缺席代理主教，而黎塞留的事业根本没有因他堕落的坏名声而受到任何阻碍，尽管和其他人一样，人们也怀疑他在放荡的案卷中又增添了邪恶的和亵圣的行为记录。

无论从哪方面讲，萨德为此得到惩罚的罪行都不是特殊的。主人定期地诱惑仆人，而绅士们虐待他们花钱雇来的姑娘，有时竟达到致残的程度。鞭打在当时广泛流行，成为一时的时尚——一七六五年一份警署的报告对巴黎妓院中吊把的“惊人”的消耗作了评论——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也成为当时风尚。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推断巴黎有四十万活跃的同性恋者（“从公爵到他

们的男仆和普通百姓”)。鸡奸是死罪，但当局对此谨慎行事。他们的谨慎受到普遍赞同。一七八一年，《秘史》评论道：“这种罪行已经变得极为平常而且充斥着法庭。它需要一种非常微妙的处理方式，而假如人们要严格地实施制裁它的法律，这种作法便是不可能的了；对那些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视而不见，要比引起公众对它的关注使得它得到更广的普及的作法更受人欢迎。”确实，一个名叫帕斯卡尔的鸡奸者，原是一位牧师，在一七八三年被用刑车处死。但是，他的罪过是严厉的，他的案例被认作典范。

很明显，萨德也被认作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罗丝·凯勒的事件上，他是社会道德强烈的和不利的反应的牺牲品，而这种命运同样也可以轻易地落在二十几个贵族恶棍的身上。在马赛的风波中，他是他所代表的贵族与审判他的议会之间更为广泛的政治斗争的人质。他也是“有国王封印的信件”的牺牲品，这是一种随意地行使公正权利的制度，其中许多显然都是不公正的谴责。一八〇〇年，他与新的道德氛围和自那时起已经成为处理政治上持不同见解者的标准方法的举措发生冲突：他被称作疯子并被关进了一家疯人院。萨德的行为，尽管现在看来似乎令人惊骇，但并不比他同时代的许多淫棍的行为更恶劣，而且，当将它与作为法律制度的日常程序的野蛮的公开处死以及极其怕的折磨作进一步对比时，实际上，他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很不喜欢冒险的色情虐待狂。在一七八一年，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是的，我是个放荡的人，我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我曾梦想去做在那一领域可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我当然没有做成我梦想过的所有的事情，而且也永远不会。我也许是放荡的人，但我不是个罪犯，我不是一个谋杀者。”

但是如果他拥有自由，他会将所有这些梦想都化为现实吗？他的法官们，他的看守们，甚至他的家人都将他称作“不可救药的

人”和“疯子”，而且很显然认为他会是这样。但是，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一七九〇年在他被释放时，他没有变得疯狂。他并没有抓住大革命提供的特殊机遇去实施暴行，这些暴行是他不断地为他书中的主人公们创造的。罗伯斯俾尔在现实中完成的恐怖行为，萨德仅仅在纸上想象它们。他与凯内特夫人满足于家庭生活，并且甚至不能说服自己将德·蒙特勒伊局长夫人送上绞架，尽管这样做完全属于他的职权范围。

但是，萨德在他获得自由的二十年时间里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丧失机遇的历史，而且也是他写作的事物与他所做的和所相信的事物之间矛盾冲突的典型。一七八九年前，他期盼着猛烈推翻那种社会秩序，但是，当被禁止象一个封建君主一样行事时，他又强烈地抱怨。革命来临时他是它温和的支持者，但他拒绝接受它所主张的平等和博爱的观点，并且狂热地坚持他顽固的个人主义主张。作为哲学家，他懂得无论一个个体是死是活，是自由的或是在监狱里，对于自然完全是一件毫无相干的事情，但是，他从不接受他自己命运的宇宙的任意裁决。他书写弱者被强者所操纵的狂热诗歌，但他从未想到局长夫人就是他的教义的一个成功的实例，尽管她对他做了《美德的不幸》中恶棍们对朱斯蒂娜所做的一切。总之，萨德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态度和残酷几乎与人们所知的他的所有品行不相一致。与其说他是一个“堕落的怪物”，毋宁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贵人”，尽管他思想开明，但却认为大多数人都是低下的，因而带着贵族的轻蔑对待他们。

萨德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很明显地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谣言同样对他不利。一七六八年在他被捕一周后，巴黎沙龙的第一夫人，迪·德芳德夫人，寄给在伦敦的贺拉斯·瓦尔波勒的一封信，描述了耸人听闻的阿尔居尼厄事件，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听到当时恶意中伤地传播丑闻者的清晰回声。“他挥舞着从兜里

掏出的手枪……残酷地鞭打她……而且用小刀在她全身切割”，“非但不否认他的罪行，耻辱地将自己吊死，相反他声言他做了一件善事，为公众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就是说，发明了一种使伤口很快愈合的药膏”。一七七二年当马赛风波的消息传出时，萨德秘密的“享乐集会”公开和私下地被传说为酒神节的狂欢；据说他故意下过毒的那些糖果引起了“无数”人的死亡，其中包括萨德夫人。到一七八八年，当雷斯蒂夫·德·拉布雷多娜重述这些传说时，萨德已经成了一个活体解剖者。雷斯蒂夫宣称他曾询问过一个有幸逃过落在罗丝·凯勒身上的恶运的女人。萨德曾认为她是他作生理学研究的合适的对象，将她领进了一间密室。“她发誓她在那儿看到三具尸体：一个仅是一副骨架；另一副被剖开，保存在一个大罐子里；还有一个刚刚被杀死的男人的尸体……”雷斯蒂夫还声言他曾亲眼目睹过那个具谋杀意味的狂欢，尽管在他的描述中狂欢发生的地点由马赛变换到了巴黎。“德·S边开门边大笑起来。在里面，我们发现不同性别的年轻人成堆地躺在地上，有些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其他人则被偷偷放入酒中的毒药折磨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

萨德罪行的这种令人震惊的夸张更加令人相信，因为它们既反映了又刺激了公众普通的恐惧。在他的行为中存在的“贵人的权利”的强烈暗示，证明他就是一个封建暴君，而渎圣的控诉是他不信仰任何事物的证明。这两件事都充满了对人类尊严的蔑视，而且更激发了对残忍行径的实践意图。他的动机是凶恶的，但是更恶劣的是，他做出的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都是冷酷而且精心策划的。他在罗丝·凯勒身上试验一种药膏的那个声明，再加上他对毒药品性的了解，为他的残忍赋予了一种无情的科学实验的特点。萨德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标准的贵族独裁而受到憎恨，他还是一个炼丹术士，一个恶魔，一个魔术师。以超人的速度，萨德很